

北區想象

一篇社會文本的人類學式筆記

陳炳輝*



〔圖1〕從澳門望廈山眺望北區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卡爾·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1852

今日我們所稱的“北區”，官方定義為“花地瑪堂區”。據澳門的地理書記載，它包括了台山、祐

漢、黑沙環、馬場、青洲、筷子基、望廈和新口岸水塘一帶範圍〔圖1〕。⁽¹⁾

在不少人的概念裡，對“北區”的確實地理所指，似乎有點含糊不清，有的說台山、祐漢、黑沙環、青洲和筷子基，有的多了馬場少了望廈，總是不太能一下子指出它的具體範圍。但要是僅指對北

* 陳炳輝，臺灣大學人類學學士、人類學研究所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區的印象／想象，則相對來說還較清晰。當您提及北區並問及人們對北區的看法時，一些關於北區的概念化想象就油然而起，這從近些日子以來有關澳門“舊區重整”的熱門話題，以及“北區藝術計劃”的相關論述裡亦能感受一二。

據某報章論述：“從澳葡當局在祐漢關街開坊後，此街區堪稱‘典型’了——澳葡統治下髒亂差的典型（……），完全不與澳門中區及提柯區人文接軌的‘異域’典型。”⁽²⁾這段陳述雖然針對的是祐漢區，但它所反映的，除了可能是屬於當時澳葡政府對祐漢——這個“北區”代表的看法外，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澳門人對“北區”的想象，一種關於他者（others）的概念型態。

本文／本筆記嘗試透過澳門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話語——包括報章報導、活動文宣、訪談記錄，以及引述二手訪談資料等來闡述這種想象的存在。分析的資料在2004-2008年間蒐集，而筆記也從2004年起斷斷續續地撰寫。透過考察“北區想象”的內涵，我們不難發現，這種想象可能是“澳門人”建構自身文化認同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³⁾而這種想象，更可能不知不覺地滲透入我們對“北區裡”所做的各種表述、改造和操控之中。

歷史、地理與記憶中的北區

“北區”地理在歷史上的形成，可追溯至20世紀初期，那時“北區”仍祇是一塊自北向南、與大陸連接望廈山麓的狹長陸地。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得十分快速、至今可算是澳門人丁最旺盛的地區，其地理上的形成，可說是始於1910年代的一系列大型填海工程，台山、青洲大馬路兩側、筷子基〔圖2〕及蓮峰球場附近一帶區域就在此時起填築而成。

1923年起的填海工程，造成了馬場〔圖3〕和黑沙環區。其後，若干小型填海工程斷續進行，直至1990年代初，一個針對黑沙環區的大型填海開發工程再次動工，至90年代後半期大致完成。“北區”至今成為佔地廣大而人口稠密的“新”開發區域，估計約佔澳門總人口40%或以上〔圖4〕。

據說葡人在16世紀中期首次踏足澳門時，澳門人口祇有幾百。⁽⁴⁾20世紀初期，澳門人口方超過五萬。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當時抗日戰爭爆發，澳門因沒被日人佔領的關係，引致鄰近地區大量人口湧入，成為一處避難所。戰時的澳門人口最高峰，估計超過三十萬，但



〔圖2〕擔水婦，1960年代，澳門筷子基（李超宏攝影作品 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

戰後隨即迅速下降，1950年澳門人口降至十八萬左右。⁽⁵⁾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間，由於中國內地發生飢荒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東南亞的排華浪潮等因素，使澳門人口增長相當快速，其中僅1962年上半年就有五萬五千名華僑湧入澳門。⁽⁶⁾據說1960年代，澳門人群基本上區分為三個種類：葡人、土生葡人和華人。這種區分亦反映在他們相對分明的居住界線上。現處中年、在下環街成長的“鴻斌”，回憶起少時在他居住範圍所感知到的族群分佈情況：“以往土生和葡人主要集中在西望洋山、亞婆井街及西環一帶，當然那裡四週環境較好、較整齊。而本地華人或老街坊主要集中在媽閣街、高樓街至龍嵩街一帶，以及鄭家大屋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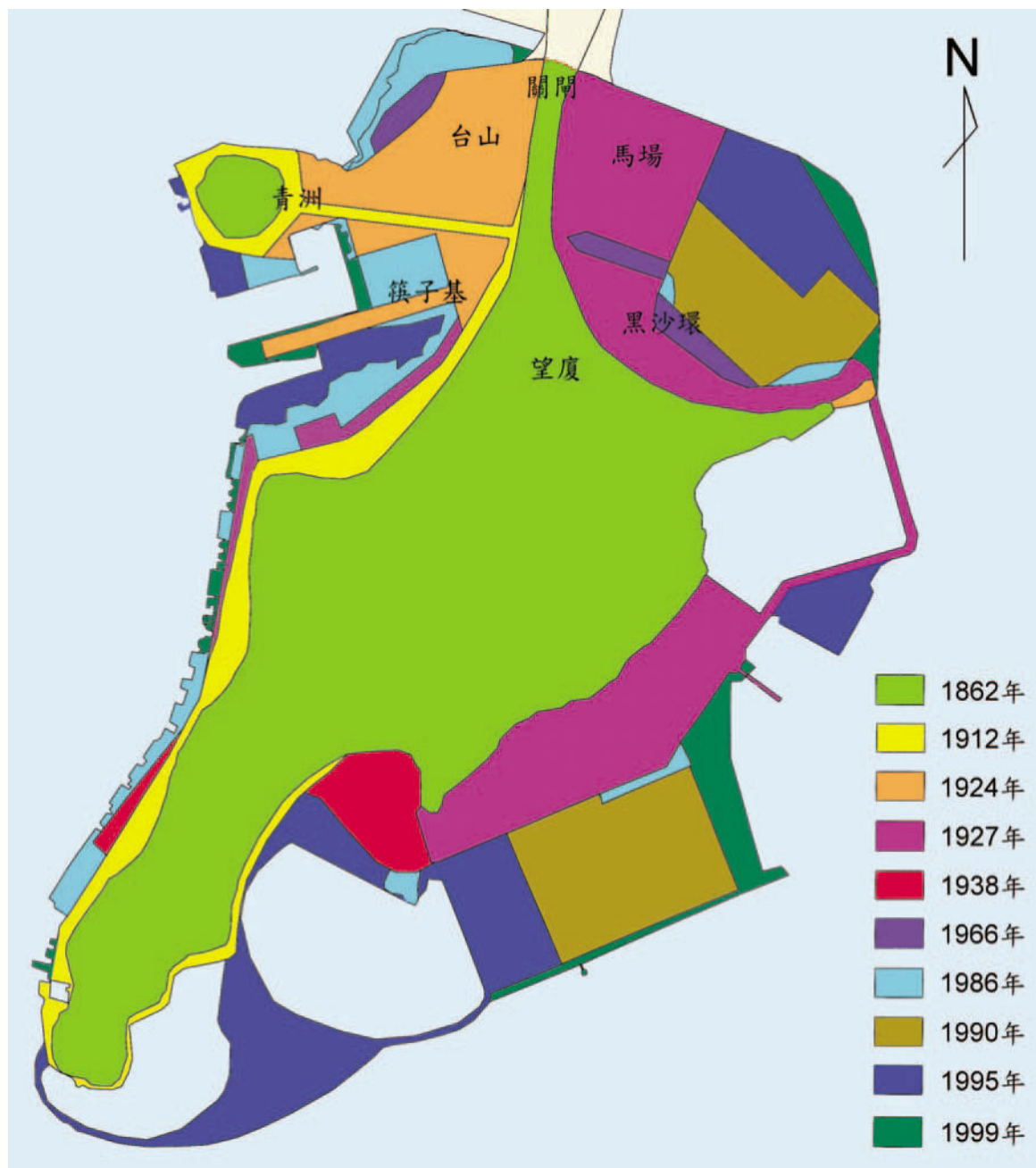
我們在此暫且將20世紀70年代或以前定居澳門的人稱為“老澳門”⁽⁷⁾，他們包括了多數的“老華

人”和少數的土生葡人及其他非葡裔人士。“老華人”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另有一些來自五湖四海，包括了若干來自東南亞的華僑。這些“老澳門”中的一部分，隨着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填海工程，漸漸住進北區，尤以較早的填海工程造就的青洲和台山區等居住了不少“老澳門”，包括了一些土生葡人也遷入了此區。20世紀70年代中期生於澳門、兒時住在台山第五街的“豬的”與住在台山平民大廈的“花生”就憶述：“兒時與住在鄰街的朋友一同去‘警察球場’（現改建為‘工人球場’，位於關閘附近）踢波，有兩、三個都是土生，記得有個叫‘Linu’，有個叫‘笠臣’，還有其他土生，祇是沒有在一起玩。”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於中國內地在文革結束後放寬了移民政策，引致不少中國內



〔圖3〕扶貧送暖·1969年澳門馬場居民聯誼會（歐平攝影作品 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4〕填海工程與澳門半島海岸線變遷示意圖（綜合自註（1）中各海岸線變遷圖而成）

地華人移居澳門，為這個人工擴展中的“北區”帶來了新景象。據澳葡政府統計數字顯示，僅在1981-1982年間，澳葡當局向新移民發出的身份證就達五萬張，一般估計在1978-1983年間，自內地移居澳門人數超過十萬。^{〔8〕}不過其中約四分之一

很快便移居至香港或海外地區。^{〔9〕}1984年以後，澳葡政府和中國內地就移民問題達成協議，每年祇批准一千四百四十名合法移民。^{〔10〕}澳門回歸以後，經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雙方再協定，從2000年5月起，受理澳門永久居民與中國公民在內地

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有序地赴澳定居的申請，每月名額四百二十個。⁽¹¹⁾

隨着澳門現代經濟的起步，對內地鄰近區域形成“牽引因素”，20世紀80年代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來澳的中國移民數量遽增。在1982-1990年之間，澳門政府先後三次特赦了總數超過七萬人的非法內地移民。在1990年3月29日仍為高中生的“苑玲”，憶述她當天上學路過跑狗場時所目睹的情況：“我看到很多人塞滿狗場門口，真的很多人，很誇張，我從未想過澳門有那麼多黑市居民。”直至目前為止，每年合法移居澳門的內地華人正穩步遞增，而非法移居澳門的內地華人人數則較難估計。這些“新移民”（包括了合法的和非法的）不少以北區為家。他們締造了這些小區的經濟騰飛，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後，“北區”迅速成為新興的輕工業區，迄今曾出現的行業有紡織、製衣、塑膠、玩具、皮革、電子、電力等等⁽¹²⁾，而“新移民”正是活化這些小區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他們活化的並不祇有這些小區。

異質地誌學中的北區

“異質空間”（heterotopias）是一種充滿了並置的想象、真實與異質性的空間。借用傅柯（M. Foucault）的異質地誌學（heterotopology）觀點來看“北區”，它猶如一個“異質空間”，一種作為“反場域”（counter-sites）的現實空間，所有存在於個別文化／社會中的真實場域（real sites）的意義，都藉由再現的過程，在“反場域”中不斷地進行辯證與翻轉。這種“反場域”就像是鏡子的影像般，既真實又虛幻——透過鏡子我們被呈現、倒轉，看見自己的真實存在／反映，然而我們不要忘了，鏡子裡的空間卻是一個“無的地方”，我們是從虛像的空間中發現和重構自我。⁽¹³⁾

在不少“老澳門”的概念裡，“北區”總是與“新移民”聯結起來，對於住在“北區”以外的“老澳門”看來，這種聯結十分明顯。“新移民”這個術語見諸文字定義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後來澳定

居者。⁽¹⁴⁾人類學者克萊頓（C. H. Clayton）曾在澳門回歸前後與一些“澳門人”進行訪談，訪問他們關於“新移民”的看法，幾位“老澳門”都指出“他們融入不了澳門社會”。⁽¹⁵⁾據一些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指出，新移民在移居澳門初期存在着適應上的困難。⁽¹⁶⁾這或許並非鮮見的事，在不同地區的社會裡，新移民都很容易產生適應上的問題，祇是移民的問題層出不窮而已。綜觀澳門歷史自四百多年前至今，可以說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移民城市，今日“老澳門”與“新移民”的碰撞，實際上正是一個新、舊移民的對話。

在克萊頓的訪談中有兩條資料特別有趣，可借用來在此引論。其中一條，關於一位土生葡人男子講述他一段不太愉快的經歷：“有一次他坐錯巴士，最後在北區下了車，當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祇見街道的佈局異常混亂，巴士迂迴曲折地行駛。更甚者，那裡的巴士站牌和老城區的不同，完全用中文字寫，而中文他祇會說白話而不會讀。因此，他感到很氣憤，覺得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像是一個‘老外’似的。他擔心在回歸以後，這種潛藏的異化感覺，正等待着他和整個土生葡人族羣。”他的例子，說明了“北區”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一些關於種族的、地理上的、語言的異化感覺。⁽¹⁷⁾在後過渡時期，不少土生葡人都有同感。而這種異化感覺在澳門的“老華人”身上多少亦有反映，這實際上是與居住的地域不同和認同身份的差異等問題息息相關的。

一位中區的張姓士多老闆說道：“北區住了很多新移民，特別是福建人，他們一味祇顧着工作，根本不會生活享受，他們有的一天打兩份工，早上一份，晚上一份沒錢但包住的，他們有些連住處都沒有，祇會拚命賺錢。”另一位“老華人”說：“他們大概不會把澳門當成自己的家，他們又不會說廣東話，拚命賺錢祇為了大陸的家。”近年因為內地開放自由行的關係，很多來澳打散工賺錢的“自由行”經常雲集北區的三角花園附近，不知道會否更深化了“老澳門”眼中有關“內地客”、“新移民”與“北區”的連結。

事實上，如前所述，在北區生活着很多來自不同地方與背景的人，他們包括了部分“老華人”、土生葡人、東南亞的華僑，甚至部分非華裔、葡裔人士，而大多數的“新移民”，也是來自廣東和福建境內操幾種不同方言的群體，更有來自非粵、閩地區的內地人士，故此可以說“多元文化在北區”，又或是“龍蛇混雜在北區”（一位北區“老華人”的話語）。但這些先後來到北區生活的離散社群，在人們的想象中卻是同一的。

將“新移民”與整個“北區”在概念上單一化地串聯起來，似乎在“澳門人”的日常生活話語中常常語帶雙關。一位屬於中產階級的“老華人”說道：“住在北區的人，大多都是新移民，他們的知識水準較低，所以他們做的工作自然也低下了。”另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訴我：“住在北區的那些新移民後代的小朋友，很少能夠接觸到文化藝術，我們要想辦法去幫助他們。”這樣將“北區”與“新移民”聯繫起來想象，似乎除了涉及產生“外來的”與“本地的”之間在文化、教育上的位階差異外，亦被想象成為一種地域性的分化，就連本地的藝術團體都要想個計劃“走入北區”，“將藝術創作的意念帶到北區每一角落”（活動文宣）。一位土生土長的藝術家說道：“他們對藝術的反應很奇特、很不同！”這些話語，暗含了一些關於他者的文化想象的有趣現象，彷彿認為住在“北區的人”與“澳門人”大不相同。而北區在這裡，已被想象成了澳門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的空間”，就像是傅柯所說的“異質空間”，它被想象成為有一條被虛擬的、被劃定出來的疆界，隔離於澳門其它地區，缺乏流動性。

一位本地的藝術家在報章上對其攝影作品發表創作感言時，對北區有以下的描述：“（……）對於一個算是很熟悉這城市的我來說，還可以發現甚麼去拍呢？我先想到北區，那個於我而言十分陌生的地方，為拍這系列，我多次走進祐漢新村那陰暗幽深的巷子裡時像在迷宮裡探險，原來那大廈與大廈之間的過道會是如此的讓人心寒，那裡似乎是另一個世界的縮影，原來澳門還有這樣黑乎乎的走廊，當我小心地從這個建築走到另一幢時，真會心跳加

倍。我曾一口氣爬上屋頂透透氣，也試着從更高的角度去俯視四週環境，畢竟這裡也是澳門的一部分呀！雖然看起來這麼擁擠，那麼凌亂。”⁽¹⁸⁾ 這段文字真切地反映了藝術家對他十分陌生的“北區”的看法，彷彿“北區”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異地。然而，對於一些住在北區的人而言，卻可能是十分親切熟悉的街頭巷尾。

傅柯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嘗試在現實中指出“異質空間”的真確位置，但實際上它乃是位居於一切地方之外（outside of all places）。這些“異質空間”截然不同於它們所再現的每個文化／社會裡的一切真實存在的場域。⁽¹⁹⁾ 將“老澳門”及其住區，與“新移民”及“北區”，譬喻為並置於鏡子的內外關係般，“老澳門”對“北區”的想象，正是一種對“異質空間”的凝視。透過想象這種“異質空間”如鏡子般的反映，“老澳門”藉以再現和重構自我。“想象的北區”存在於想象之中，它自然外現於其它地方之遙。然而“北區”並非完全是想象的，它具有地理上的客觀環境及其它的現實條件，因此，它猶如索雅（E. W. Soja）所說的“第三空間”（Thirdspace），是一個由真實的“第一空間”（Firstspace）與想象的“第二空間”（Secondspace）混雜起來的“既真實又想象的地方”（real and imagined / real and imagined places）。⁽²⁰⁾ 我們隨着這篇筆記，正航向真實與想象的“北區”的探索旅程。

作為“他者之域”的北區

將“北區”看成與別不同的社區，並一再喚起和提昇對它的關注，當中暗含了“異域疆界”、外來的“新移民”與“本土”的身份與位階的差異以及對這些概念單一化的統合想象，於是“北區人”成為公共領域中被表述的他者，“北區”成為“他者之域”。⁽²¹⁾ 而這種喚起的關注，在近年熱呼呼的舊區重整問題下，以及由本地藝術團體策動的“北區藝術計劃”的強力推動下變得更為明顯。

本地的一個藝術團體自2004年起，每年在北區舉行大型的公共藝術活動，其目的為“讓居民在日



〔圖5〕北區藝術計劃於筷子基北灣休憩區（2005年）

常生活中亦能與藝術相遇”（活動文宣）。2005年，藝術團體組織了三十位藝術工作者及愛好者，以具有澳門特色的瓷磚路牌為創作對象，由創作者自由發揮，“希望藉着藝術作品美化北區市容，發掘北區被忽略的美態，將藝術帶入社區、融入市民生活”（活動文宣）。瓷磚路牌被放置在筷子基北灣休憩區和黑沙環公園等地展出〔圖5〕。

透過對展區的現場觀察及訪問行人對這些展品的觀感，可以瞭解藝術團體“將藝術（……）融入市民生活”的這套論述（discourse）與現實情況的落差。一名住在筷子基附近正在散步的中年男子說道：“我並不明白這些東西放在這裡有甚麼意義，不過它們沒有妨礙我的生活。”另一名提着菜籃的中年女子，看到一件被其他人塗鴉了的藝術作品〔圖6〕後，並不想表示意見，快步離去。這件藝術

作品被人劃了一個男性生殖器官，新、舊的視覺元素形成一個混合的圖像，超越了創作者原來的意念，產生出另一層次的二元對立的象徵意涵，它隱含着“主體”對“他者”、“強勢”對“弱勢”、“高質”對“低質”、“拯救”對“被救”、“外來”對“本土”等等對比的視覺隱喻。在這裡，曾在其它層面被認為是弱勢的藝術團體，搖身一變成為強勢的主體，以外來者的姿態導入了詮釋“在地的他者”的觀點。它帶給了我們一個重新思考的契機：我們正在以甚麼樣的姿態進入這個社區？

藝術團體於2006年再次走入“北區”的屋村大廈，在中秋節期間以燈籠為媒介，由數十位本地藝術家 and 有興趣人士共同參與，“在傳統燈籠的構架上進行創作，為傳統的形象注入新的意念及思考，作品懸掛於多座大廈的大門上，除了增加社區內的



〔圖6〕一件被塗鴉了的瓷磚路牌“作品”

節日氣氛外，還可以讓平時為餬口奔波的民眾，在節日裡也能隨時感受到藝術之美”（活動文宣）。創作的燈籠被放置在筷子基巴士總站、宏開大廈和宏建大廈一帶。

宏建大廈的管理員表示：“燈籠掛入大廈範圍內不久，由於受到不少大廈住客的投訴，所以決定把燈籠全部取下來。”一位藝術工作者在報章上討論藝術教育時亦談到這個例子：“（……）創意的燈籠在顏色上觸犯了居民的禁忌，有人一夜間將這些藝術品拆下丟掉（……）。究竟社區藝術的意義是甚麼？它是讓藝術重回民眾的身邊，還是加深人們日常生活與藝術之間的二元對立？”^{（22）}他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思考。在這裡，藝術品雖放進了社區，但未融入社區。當藝術團體在一邊述說着他們美化社區這套論述的同時，社區居民卻在另一邊感受着莫名的煩擾。藝術團體的“北區計劃”狹道強勢地嘗試走入市民生活，但我們又曾對在地居民的觀點考慮過多少？

一位參與策劃“北區計劃”的藝術家向我透露：“一般認為住在北區的人接受教育水平較低，我一下子也不太能說清楚北區到底包括了哪幾個小區，我們設定北區的藝術計劃，就是想既然藝術空間已進入了這個社區，何不為這個社區做點事？”民間藝術團體本身在資源不甚充裕的情況下，仍為心目中的弱勢社群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實屬難能可貴。然而追溯這位非住在北區的藝術家原來也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從內地來澳的“新移民”，卻突顯了居住的地域空間不同而衍生出來的位階差異，就像是一位“新移民”現在已不是“新移民”的身份去為“北區的人”做點事。

克萊頓的另外一條有趣的訪談資料，更進一步地說明了地域差異與身份認同的關係。那是關於一位受過專業教育、從上海來澳執教的李小姐，她住在氹仔，而且學會了說廣東話，當她說自己是一個“新移民”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她在開玩笑，即使她比許多住在北區的“新移民”來得還要晚。^{（23）}這個例子說明了地域和語言是作為“新移民”標記的一個很重要因素，脫離了“北區”的地域空間以及對語言的掌握，便使“澳門人”對“新移民”的既有概念產生落差。

隨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氹仔新居住區及其它地區的相應發展，以及澳門地產市道在數年前曾一度低迷的情況下，“新移民”與“地域”的關係發生了實質的變化，很多來澳定居的“新移民”已不住在北區，而不少已經不新的“新移民”也遷往氹仔及澳門其它地區。直至2007年，我們對“新移民”的想象，不少仍固守在“北區”的地域範圍。想象的“北區”仍停留在人們的想象之中，一如既往地表述為“他者之域”。

作為人類學“地方”的北區

“老澳門”透過再現過程，賦予“他者”特定的空間與視覺符號，將其視為異文化而以視覺化和空間化的形式去再現，而這種視覺化和空間化又以“鏡像”的方式反映着“自我”本身，以及觀看“他

者”的立場與視角，這是“澳門人”的文化身份再現策略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北區想象的形成，正是“老澳門”塑造自我文化身份的重要對話空間。套用克萊頓的一句話：“每次說我們是誰，即包含了我們不是誰的意思。”⁽²⁴⁾同樣，每次說他們是誰，正是從凸顯他者的差異中去確立自我的文化身份。祇是這裡說的“他們”總是既真實又想象、異質，而“我們”又是在想象和差異的對照中建構起來的。我們是誰，是一個不斷地重新定義的辯證過程，“差異”與“認同”，就在澳門人的對話中不斷地浮現。

從以上的審視角度來回看近年“北區”“舊區重整”的相關問題，一方面它在澳門的歷史發展上算是“新的”——是在近一個世紀裡才被人工擴建而成，但卻又在話語中被納入了“舊的”範圍去加以重整；而另一方面，它又被認為是“新的”，如報章論述：“其不過祇有幾十年的開坊成街歷史，（……）沒有人文歷史底蘊（……）”⁽²⁵⁾然而歷史從來不是一個平面，它從來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續而成，有人的地方就有歷史積累，而“人文”總是與生活空間和建築環境相互接軌。將“北區”視為“異域”並提昇起它與“老澳門”之間的差異性，事實上正說明了“北區”在澳門的歷史境遇中有其自我不斷塑造的文化特色。這些特色一直緊扣着澳門，它可以“大區”（北區）、也可以“小區”（祐漢、台山區等）來論述，正如你在歐洲可能會說自己是中國人，在香港可能會說自己是澳門人，在澳門你會說自己住在北區的一樣。若我們一味祇站在關於“老澳門”四百多年來“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觀中，“北區的人”自然是沒有歷史的人。

一個專門研究空間的法國人類學家歐莒（Marc Augé），分析現代社會的空間性，將其分為“地方”（place）與“非地方”（non-place）。⁽²⁶⁾所謂“地方”，與人們的成長經驗和集體記憶有關，由空間內的人豐富其內涵，營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空間，它總給我們不自覺地建構為自身文化認同的依據，凝聚地方的歸屬感。而所謂“非地方”，實是相對於人類學的“地方”而言，例如機場、候客室、地鐵站、提款機、找換店、高速公路、大型購物商場

等，每個地點都是相似的，這種“non-places”凝聚不了歸屬感，人的行為不容易改變這些空間的性質。它與社會文化歷史和認同記憶沒有直接的關連，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為了滿足全球化的文化旅遊觀光事業、跨國境的商業和資本流動之下而被大量重複製造出來的空間。在今日世界的各個“地方”裡，“non-places”幾乎都不會缺席，其均質化的特性，營造出無論走到哪裡都像是同一模樣的繁榮城市。但反過來看，如祐漢街市附近放着雜物的街道和後巷，雖然也是公共的，但您總會覺得那是人家的“地頭”，因為那裡充滿了屬於人群本身的生活積累和記憶。北區，是一處充滿了很多人類學標記的“地方”。

當各方主體（至少包括了政府官員、建築師、發展商、在地居民、文化教育團體和專家學者等）正為舊區重整問題而詮釋着“北區”，到底要找尋一個怎樣的文本、如何能找尋得這個適合的文本來進行“重整”？這顯然並非一個容易處理的問題。當報導焦點集中在“拆與賠”的問題糾葛中，大家都寄望立法以解決問題時，對舊區的重整，到底是不是給市民締造一個自上而下規劃出來的、與澳門其它新開發區或其它城市內無論走到哪裡都像是呆板一致、處處都是“non-places”的社區？我們應以怎樣的一個姿態和角度切入具體操作？有多少的人文訴求、在地的觀點和聲音被納入考慮？怎樣才能達到互為主體，而非在主客關係中對他者的詮釋？市民又有多大程度能參與發展和改造自己的社區？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心思考。

隨着近年澳門乘坐“開放賭業”這班特快車超速前進，社會的軟、硬體環境不斷地瓦解和重新組合，但歷史與人文並沒有因為這個新形勢的出現而停止時間的積澱作用。住在黑沙環區的何小姐講述她姐姐的日常生活：“她家每逢週六、日都舉家回鄉，我們鄉下很近，在順德，約兩小時多車程便到，她一家每星期都如此在澳門與內地兩邊走。”而住在祐漢區、父母也是“新移民”的十五歲胡姓小朋友，卻認為“澳門是我家”。很明顯，一些人的歸屬感正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漸漸變化着，越來越多人



〔圖7〕充滿喜悅、健康與未來的“北區”小朋友。想象未來，我們的澳門將會變成怎樣子？

視澳門為家。與此同時，亦有越來越多人不滿意澳門的當下與可預視的未來環境〔圖7〕。

結語

這篇筆記記錄了一些“澳門人”關於“北區”的想象。在這裡，並未否認部分的“北區”環境相對來說較為擁擠，也從未否定本地藝術團體為澳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對“北區”的表述，都來自於過度的詮釋和想象的結果。

克萊頓認為，在1990年代澳門社會經濟和政治快速變化的壓力下，“澳門人”在日常話語中對“新移民”的論述，實際上建構出的反而是“屬於澳門的華人”自身這一個新的社會族類。⁽²⁷⁾進而，這種族

群想象的浮現，可能早自1982-1990年間澳門政府先後三次特赦非法內地移民的過程中已漸露端倪〔圖8〕⁽²⁸⁾。透過轟動澳門社會的特赦事件與族群記憶，伴隨着其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新土地開發和拓展的變遷，在既存環境下的“澳門人”，漸漸地集體想象“他者”及其地域疆界。

澳門作為一個“流動島”⁽²⁹⁾，移民流動的頻仍，造就了島內新、舊移民的對話。在澳門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新移民”，正是從歷史過程中漸漸地擴散遍佈至整個澳門，並不祇是當下的“北區”。隨着近年澳門社會與經濟形態的急遽變遷，在連“北區”都已出現“超級豪宅”的今天，有關“北區”、“新移民”、“澳門人”的概念，實際上有着更為變化複雜的內涵，並不止於我們目前單一的概念化的想象。

如果在 20 世紀初期的澳門人口祇有幾萬的話，那麼澳門發展至現有的規模，近一個世紀以來被人工擴建而成的“北區”，則一直緊扣着澳門的人文與歷史的發展。“舊移民”及其後代對“新移民”及其後代的想象，實際上是百步與五十步的歷史關係，而前、後兩者都應有着複雜的內涵。概言之，不論是“北區”或是“北區”以外地區的居住人群，其詮釋的文本理應都是動態而十分複雜的。

我們的社會正在全球化旅遊觀光事業與賭博娛樂事業的軌道上轟然前進，越來越多的“non-places”遍佈澳門，若我們要談舊區重整，何不嘗試注入更多由市民參與發展和進行的社區營造概念。令人欣喜的是，2007 年的“北區青洲藝術計劃”，已有別於前幾年的形式，注入了更多在地參與的元素。據一位評論者在報章上引論說，這次“整合了口述歷史、視覺藝術與戲劇三個方面，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藝術創作，“走訪曾在青洲住過四十多年的

法國修女思華（Dominique）”，並“特別請來在青洲營業的灶記咖啡老闆，在展場擺設灶記自家生財的低檯矮櫈，準備了灶記的咖啡、奶茶與茶點以為開幕之用”。這個“在地性”濃鬱的藝術活動，“可說是本澳首次從社區關懷的人文角度出發，去追溯見證社區的歷史，試圖留住熟悉的社區鄰里的氣氛與景觀，企圖在青洲木屋區消失以前，透過回憶往事的集體記憶與社區現狀產生另類的對話。”⁽³⁰⁾這次藝術計劃的相對成功，說明了“在地主體”的參與以及詮釋的觀點可以漸漸地邁向互為主體的可能性。

從 2004-2007 年的“北區藝術計劃”過渡至 2008 年的“都係澳門人：從被忽略社群出發多元創作展”，藝術團體仍“集中精力投放在社區文化的整理、發掘中”，“將重心放在不同社區裡被人忽略的一群，希望透過年輕一代不同背景的創作人眼光去發現、認知及反省這些弱勢社群的不同生活面貌”（展覽文宣）。在是次展覽中，年輕藝術家的多元化作品相



〔圖 8〕1990 年澳葡政府於跑狗場設立臨時登記處特赦無證人士，竟稱為“龍的行動”⁽²⁸⁾。

當出色。然而就策展方向而言，卻又重新回到較遠距離地想象和詮釋“他者”的原點。當藝術活動打響“社區藝術”的旗號，涉及所謂“社區的弱勢社群”時，令人不禁想問：社區藝術的意義為何？是否一定要透過發現和喚起“弱勢社群”來達成？何為“弱勢”？我們社區中不同層面的人裡，甚麼人被人標籤為“弱勢”，又甚麼人標籤他人為“弱勢”？甚麼人站在甚麼位置做了這樣的判定？被標籤為“弱勢”的社群何時才能真正以“主體”的身份來表述自己？“詮釋他者”的觀點有沒有開發新路的可能性？這些問題，我想是嘗試“走入社區”的人或團體應該深思的。

當看到從小到大、每年舉行校運會時都有機會走入至少一次的跑狗場，外牆上出現了類似“吳哥窟”的浮雕和裝飾時赫然發現，一些屬於澳門本地的文化特色，並未因為申遺成功的助力而倖存，反而可能消失得更快。抬頭一瞥，松山燈塔旁也險些兒蓋上摩天高樓！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家？一個怎樣的“澳門”？這篇社會論述的人類學式筆記，正是筆者——這個土生土長、一直住在北區的“老澳門”的一個感知四周、思慮現狀和反省“自我”的開端。

（本文最後於2008年7月12日凌晨三時在筆者北區寓所內定稿。草撰期間，獲臺灣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臺灣靜宜大學講師、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梁英華先生（澳門人）和澳門臨床心理師張轉乾小姐提供不少意見，澳門攝影家歐平先生和李超宏先生准許在下使用其攝影作品〔圖2〕和〔圖3〕，澳門藝術博物館提供上述兩位先生作品的館藏圖像資料，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碩士趙月紅小姐提供北區小朋友的照片〔圖7〕（照片後經影像處理），在此謹致以萬分謝意！當然，一切文責則由筆者自負。）

【註】

- (1) (9) 黃就順、鄧漢增、黃鈞桑、鄭天祥：《澳門地理》，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澳門基金會、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頁5，1993年；黃就順、鄧漢增、黃鈞桑合編：《澳門地圖集》，澳門基金會出版，1997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中國科學院地理信息產業發展中心編製：《澳門地圖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出版，2005年。

- (2) (25) 阿蓮：〈蓮妹手記〉2005年元月17日，《澳門訊報》網上版。
- (3) 當然，今日誰是“澳門人”仍是一個很複雜而值得不斷地辯證思考的問題。
- (4) (10) 余振、劉伯龍、吳德榮：《澳門華人政府文化》，澳門基金會出版，頁2，1993年。
- (5) 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澳門：中流出版社，頁12-18，1988年。
- (6) (11) 黃漢強、程惕潔：《新來澳門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2005年，頁11，頁2。
- (7) 這個劃分在這裡是臨時的，為了接下來的行文方便，並非一個固化的概念，正如註釋(3)提到的一樣，“老澳門”也有着複雜而辯證的意涵。何謂“澳門人”？何謂“老澳門”？這些問題有着糾纏不清、難以排解的關係。
- (8) 黃就順、鄧漢增：〈澳門的人口與都市成長〉，《澳門人口發展預測》，東亞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頁183，1990年。
- (12) 黃漢強、吳志良：《澳門總覽》，頁8，1996年。
- (13) (19)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in *Diacritics* Vol. 16, pp. 24, 1986 (1967); 陳衍秀, “Another Place, An/ Other Place: 〈流離島影〉紀錄短片初探”, 《文化研究月報》第十四期, 2005年4月15日。
- (14)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 《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出版，頁384，2005年。
- (15) (17) (23) (24) (27) C. H. Clayton, “Discourse on the City: Identity Formation and Urban Change in Contemporary Macao”, *Review of Culture*, Vol. 3, 2002, p. 77; pp. 76-77; p. 77; p. 78.
- (16) 黃漢強、程惕潔：《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2005年。
- (18) 李灌原：〈用攝影對話——“都市漫游系列展出感言”〉，《澳門日報·攝影版》，2006年6月13日。
- (20) Edward W.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 and Imagined Spac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p. 9-16.
- (21) 借用自劉紀蕙(2001)的用語；參看劉紀蕙：《他者之域：文化身份與再現策略》，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
- (22) 蹉跎：〈顏色話題〉，《澳門日報·新園地·優質混沌》，2006年11月1日。
- (26) Marc Augé,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romwell Press, 1995.
- (28) 圖片擷取自梁英華2001年作品：《流動島》紀錄片中對相關電視新聞播放影像重新攝錄的片段。
- (29) 借用自懿靈於1987年定稿的一首詩的名字；懿靈：《流動島》，香港：詩坊出版，1990年。
- (30) 目遇之：〈藝術計劃與社區的對話——我看牛房“北區青洲藝術計劃二〇〇七”〉，《澳門日報·文化／視覺》，2007年5月22日。